

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

專題選刊

(五)

國父的宣傳志略

湯承業

中華民國
臺灣 臺北 南港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

(七十四年重新排印出版)

國父的宣傳志略

目 錄

第一章	宣傳的重要性	2
第二章	對宣傳者的訓練	7
第三章	宣傳應憑道德與真理	12
第四章	尤重文字宣傳	17
第五章	宣傳應該深入人心	28
第六章	耐心與恒心	34

國父的宣傳志略

湯 承 業

革命建國都需要力量，而發動革命建國者則為思想；要使思想成為力量，則必須經過貫通之後，而產生信仰。所以 國父說：「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民族主義第一講）。可見「貫通」的意義，實在重要，蓋未貫通的思想是死思想，而死思想就無力量。此所謂「貫通」者，即徹底明白之意，亦即將自己的思想，使對方、使群眾，完全瞭解、完全接受，因之而形成共鳴、而造成行動。此一力量、雖為有形者，但却寓於無形之中，亦正因其寓於無形，所以其力量則無所不在，亦無所不存，換言之，其無所不克、無所不成。 國父最重視此一力量。其平生致力者，就在造成此一力量；欲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就靠此一力量；故其臨終猶遺囑曰：「必須喚起民衆」。而「喚起」者，就是「宣傳」；故曰：「所用救國方法，是注重宣傳」（民族主義第一講）。可見欲求貫通思想，則必須加強宣傳；宣傳必須有其內容、有其方法，故又注重宣傳的研究與訓練；而從事宣傳者的內在條件，則在道德與學問；否則，人民不佩服，何能產生信仰！並且，既要求宣傳之普及，又要求宣傳之深入；固須常用口頭宣傳，但尤其重文字宣傳。因為宣傳的對象，為後知後覺（尤其為不知不覺）的廣大群眾，所以獻身宣傳者必須有耐心；又因宣傳為建設心理與建設國家的長久大業，所以獻身宣傳者又必須有恒心。此中之耐心與恒心，又皆基於愛同胞愛國家之愛心；所以加強耐心與恒心的

方法，則在於愛心的培養；無愛心的人，就無法致力於宣傳，亦不容其從事於宣傳；蓋恐其反作用、與反效果也。

第一章 宣傳的重要性

(一)

國父說：「從中國歷史看來，每次新舊朝代更替之際，總有幾十年的變亂」〔註一〕。所以自「辛亥革命」以來，「我國已成割據局面」；對此亂局，「如單靠我革命黨軍力統一之，實不可望」〔註二〕。因為不獨革命軍力有所不及，且兵連禍結，則救民適為害民；何況致亂之表相固為軍力，而其內在之主因，則為思想。

簡單的說，便是因為新舊潮流的衝突；詳細的說，便是因為舊思想要消滅新思想；新舊思想迭相攻擊，所以禍亂便循環不已。〔同註一〕

既為思想問題，自以和平解決為宜，所以 國父說：「本大總統這次回粵，是主張和平統一的，因為現在全國人心實在厭亂，是有輿論做我們的後援」〔註三〕。

欲求「輿論」作革命的「後援」，則必須「取和平的態度」〔註四〕，以「蕩滌舊污」，以「進行新治」〔註五〕；質而言之，則「所恃者為國民之同意與愛國之精神而已」〔註六〕。然而欲求人民由「同意」而造成「輿論」，則必須由其個體的「能知」，達成整體的「合群」〔註七〕；簡而言之，就是宣傳。

大家先知道了這個方法的更要去推廣，宣傳到全國的四萬萬人，令人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麼我們從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復起來〔同註七〕。

民國以來所以戰亂迭起者，就是因為「多數人不知自愛其寶，故強有力者得逞志於一時」〔註八〕。而國人之多數所以「不知」者，乃由於既缺乏「世界知識」，尤不知「國為民有」〔註九〕；似此麻木心情， 國父則謂其睡着了。

因為睡着了，所以我們這幾百年來文明就是退步，政治墮落，所以變成現在

不得了的局面〔註十〕。

所以「今天中國安危存亡，全在我們中國的國民睡還是醒」。所以 國父則大聲疾呼：「大家要醒！醒！醒！醒」〔同註十〕！

喚醒民衆的途徑，就是宣傳，勉勵士子「以宣傳新文化爲己任」〔註十一〕，使「人民都瞭解三民主義」〔註十二〕，其具體實施，即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註十三〕；因爲宣傳的力量，不獨可以促使國民的覺醒，並可加速國家的進步。

不知不覺是天然的進化，是自然的；有知有覺是人爲的進化，是非自然的。前者進化慢，而後者進化快。以進化快者補進化慢者，這是我們的責任〔註十四〕。

宣傳之功效所以如此，乃因「多數人總是不知不覺的」〔同註十四〕。蓋不知之人，不獨己之不願行，反而阻撓人之所願行者。

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註十五〕。所以 國父慨乎言之曰：「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同註十五〕。此即 國父所以盡力個人之宣傳外，而又發動衆人共同宣傳之原因所在；蓋宣傳無異於動員，可以形成極大的力量。

人民表面上似無能力，然要知對於某問題，既得一種直覺之瞭解，則實力異常偉大，不使槍砲，而其力大於槍砲十倍百倍而未已〔同註十三〕。蓋宣傳的力量，可以「使中國四萬萬人的心，都傾向於我黨」〔註十六〕。所以宣傳則無異於作戰，在群衆中「致力於革命之鼓吹」〔註十七〕，乃是「同向敵人猛烈進攻一樣」〔註十八〕，但其效果則絕非槍砲可及，所以 國父肯定說：

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註十九〕。當年「太平天國打了十幾年仗，還是不能成功」；就是「由於主持革命的人，沒有普遍的宣傳」〔同註十九〕。由此可知，宣傳對於革命建國，當是何等重要！所以 國父說：「處理國事，當全由國民全體講話」〔註二十〕。

(二)

武昌起義之成功，表面視之則似爲軍事力量所致，實際上，則全爲宣傳力量造成之果效。如民國元年參議院代表在孫總統解職典禮中致詞曰：

武昌起義，未一月而響應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固亡清無道所致，抑亦先生宣導鼓吹之力實多也（革命文獻第一輯五四頁）。

案「亡清無道」而所以能令漢人「含恨已深」與「積久待申」者〔註二十一〕，則由於國父之「宣導鼓吹」，例如民國前九年（一九〇三），國父指出滿清之暴虐事實曰：

各省定制衙門之外，又有所謂「營務處」者，可以不照刑律而殺人；又有所謂「清積案」之官，可以任意枉殺。屠戮之慘，波及婦孺；洗剿之廣，常連數村〔同註二十一〕。

更於民國前八年（一九〇四），公布滿清政府最慘酷的十大罪狀〔註二十二〕，如此自可激發士民敵愾同仇之心，化其痛憤而變爲力量。所以「辛亥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黨都到各處宣傳」〔註二十三〕。

案「到處宣傳」者，就是「普遍宣傳」與「深入宣傳」，辛亥革命之所以一發而得到響應、與一發而得到成功者，就是由於宣傳的深入與普遍。

當時在武昌的軍隊，是清朝訓練的，不是未黨訓練的；因爲沒有起義之先，他們受過了我們的宣傳，明白了我們的主義，才爲主義去革命。所以這種成功，完全是由於宣傳奮鬥的成功〔同註十九〕。

不獨中國如此，「俄國革命成功，也就是宣傳得力」〔同註十六〕。所以國父常藉古語以勉同志曰：「得民者，得其心也」。「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同註十六〕。而欲攻其心與得其心者，則軍隊無能爲力，捨宣傳無以爲功；就此而論，「宣傳的效力，大抵比軍隊還大」〔同註十六〕。因爲軍隊只能得土地，不能得民心，當然得民心較之得土地爲靠得住。

宣傳這種武器，折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傳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軍隊奪了城池，取了土地，還是可被推翻的，還是靠不住的〔同註十六〕。宣傳既能使人民爲之「折服」，則必然因內心之共鳴，而變爲行動的響應；此爲革命成功的原因，亦爲革命成功的保證。

重在宣傳其主義於全國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視革命二字爲神聖〔註二十四〕。

我們從前手無寸鐵，何以會革命成功呢？就是由於宣傳力〔同註十六〕。湯武革命所以被譽爲「順乎天、應乎人」者，就是因爲其始以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盤做根本，能夠注意宣傳，而不專用兵力〔同註十九〕。根據史實與經驗，國父認定「宣傳的結果，便是要招集許多好人來和本黨作事」；故曰：「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爲重」〔同註十六〕。

然而民國成立雖已十年，「一般人民並未瞭解共和是個什麼東西，他們自視也不是國民，乃是遺民」〔註二十五〕。並且「乃責革命家之造亂，謂舊時君主較愈於今」〔註二十六〕。甚至有謂「國亂民窮，眞命天子何時出現呢」〔同註十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爲國內大多數人民，還不明白民國的道理，不瞭解本黨的主義；換言之，就是「從前的破壞成功，現在的建設不能成功」〔註二十七〕。歸究言之，乃是「這幾年用武力的奮鬥太多，宣傳的奮鬥太少」〔同註十九〕。對此，國父極爲感慨，故曰：

不幸武昌成功之後，黨員即停止奮鬥〔同註二〕。

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傳事業幾乎停頓〔註二十八〕。

案黨員之停止宣傳，也就等於停止奮鬥，於是則不但「奮鬥之精神，逐漸喪失」〔同註二十八〕；並且至於「朝氣便已消滅，所以到處都是失敗」〔同註一〕。極其甚者，則是非不明，正義不張，繼之而起者，當然爲軍閥的專橫。

自清朝推倒了以後，我們便以爲軍事得勝，不必注重宣傳，甚至有把宣傳看做是無關緊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國沒有是非，引起軍閥的專橫〔同註十九〕。

在這種情況下，不獨人民徒呼「真命天子不出，中國決不能太平」〔同註十四〕。就連議員與學者，亦不明白共和之真諦與主義之真旨〔註二十九〕。所以 國父極力提倡「恢復我們從前革命的朝氣」〔同註一〕；「能於此時起而繼續奮鬥」〔同註二十八〕；具體的說，就是宣傳。

現在我們要再圖進步，希望我們的革命主義完全成功，便要恢復武昌起義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傳〔同註十九〕。

因為宣傳的成敗，繫乎革命的成敗，所以 國父不但希望「諸君須先有這項志願」，並且「還要去宣傳自己的志願」〔同註十九〕。

(三)

國父說：「本黨自成立以來，成功的次數少，失敗的次數多」〔同註二十七〕。其所以致此者，乃因「用軍隊奮鬥多，用黨員奮鬥少」〔註三十〕。釋言之，就是常懈於宣傳；再釋言之，就是未把宣傳視為力量。譬如武昌起義的成功，就是一萬多留日學生所造成的宣傳力量。

本黨從前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所得的會員，不過一萬多學生；他們回國之後，到各省去宣傳，便收辛亥武昌起義，登高一呼，全國響應，不到半年，全國統一的大效果〔同註二十七〕。

可惜民國成立之後，這批留學生以及「一般同志，都匆卒跑到政界去了；所以這革命的進行，就未免半途而廢」〔註三十一〕。並且受到「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流言蠱惑，以致「本黨放棄宣傳，這是一個大錯」〔同註二十七〕。蓋所謂「革命軍起」者，乃指專靠武力，所謂「革命黨消」者，乃指不必宣傳；故 國父曰：「以後革命黨的失敗，中華民國的失敗，都是在這一句話上頭」〔註三十二〕。

從前革命所以不怕失敗，乃因每憑宣傳的力量，可以轉敗為勝捲土重來；雖然人人皆有必勝的信心，但却未曾設想成功以後的奮鬥動向。

當時同志鼓吹革命，全憑着一腔熱血，未曾計畫革命成功以後怎樣的繼續進

行〔同註三十一〕。

但民國成立以後，「則以爲此等事（案：指宣傳），乃無效力之所爲，須握軍權，乃算奮鬥，其觀念實在錯誤」〔同註三十〕。同志們或浮於政界，或湧於軍界，以致形成宣傳陣營之真空；所以 國父則呼喚「恢復從前爲黨奮鬥之精神，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同註二十七〕。

國父自始即視宣傳爲「大事」，譬如同盟會南方支部的四組爲：軍事組、民事組、宣傳組、籌餉組〔註三十三〕，當時雖然建制簡單，而宣傳却爲其主要一環。因爲宣傳重要，所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職責亦因之而艱鉅〔註三十四〕， 國父並親自任命馮自由爲廣東宣傳局長〔註三十五〕，且曾命令在大本營設立政治訓練部，以譚平山專任政治宣傳與訓練任務〔註三十六〕。每聞同志之「盡力宣傳」者，則「不勝嘉慰」〔註三十七〕。綜觀 國父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歷次訓詞，而提示加強宣傳者爲其主要部分。

這次國民黨改組，所用救國方法，是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遍的宣傳，最主要的是演明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

民國十三年（一九〇九）北上的主要目的之一，則爲「借此機會，可作宣傳工夫」〔註三十八〕。入京後，並特委派宣傳委員分赴北方十三省區從事宣傳；爲慎重其事，於各委員離京前，先集於北京大學開宣傳會議，因 國父時已抱病在牀，特由吳敬恒講述宣傳性質及方法〔註三十九〕。 國父終生以革命爲職志，亦終生以宣傳爲職志；其所以重視宣傳，正因爲宣傳重要也。

第二章 對宣傳者的訓練

（一）

宣傳與革命的關係至爲密切，要革命就非宣傳不可，所以 國父經常連續演講，有時且一天演講數次（參見國父全集與國父年譜）；因爲其最能以宣傳爲攻擊，所以贏得「大炮」的綽號。

廣東人說我是「大炮」，「孫大炮」〔註四十〕！

此雖爲綽號，然足見 國父既倡導宣傳，又勇於宣傳。

欲宣傳工作發生大作用、產生大效果，則必須化個人宣傳爲集體宣傳，亦即必須發動群力，以進行有組織、有系統的宣傳。對此， 國父早有明示：

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從事於宣傳，但當時宣傳方法，皆是個人的宣傳；既無組織，又無系統，故收效仍小，故可謂之人自爲戰的宣傳〔註四十一〕。

「人自爲戰」的缺點，則在「黨員無訓練」，以致「奮鬥成績甚微」〔註三〕。因爲宣傳就是革命、就是救人，當然自非訓練不可。

殺人之事，尚須操練；則救人之事，更非訓練不可〔同註四十二〕。

要革命救人，不但須「明白主義」，又須「瞭解方法」；而「方法必從訓練而來」〔同註四十二〕。所以 國父由重視宣傳而重視訓練，既要創辦宣傳學校，又要設立宣傳講習所。

要有很多的宣傳人才，非要辦一個宣傳學校，慢慢的養成不可〔註四十三〕。

本黨自改組後，我們便着手開辦一個陸軍軍官學校；今晚上在此地，又開辦一個宣傳講習所〔註四十四〕。

宣傳與訓練乃是連鎖的革命工作， 國父既勇於宣傳，尤勇於訓練，故曰：「如果這種學校辦成了，我在每星期之中，也可以抽出多少時間，到學校來演講，擔負教師的責任」〔同註四十三〕。

宣傳的成敗，就是革命的成敗，所以 國父「要大家先有這項志願，立定恒心去做」〔註四十四〕；務期精益求精，達到「純熟」的境地。

我黨須每日均學習宣傳方法，時時訓練，訓練純熟，然後能戰勝一切〔同註四十二〕。

欲期以宣傳力量「戰勝一切」，則必須在受訓中努力學習，「如果自己真沒有方法，便可以請教師父」〔同註四十五〕。務必於最短期間，獲得最大效果。

吾等應當固結團體，討論一種好方法，努力去宣傳，於最短時間，使廣州百餘萬人民，皆變成革命黨，做吾等的同志。又費若干時間，努力去宣傳，使廣東三千萬同胞，以至於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有過半數變成革命黨，做吾等的同志，此真是吾黨的大成功〔同註四十一〕。

如果不靠宣傳，而單靠武力，就是「百戰百勝，亦不得謂之成功」〔同註四十一〕。所以 國父特於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辦事處」，做爲「操練宣傳的總機關」〔註四十六〕。其訓練宣傳人員，正如訓練軍伍人員一樣。

今定於每兩星期，來此學習一次，而此兩星期，須將做過之工夫，報告於我。由下一星期起，訂一種問題，互相研究，以便答聽者之問話，搜集材料。如軍隊打仗然，打過後需補充子彈，今黨員出外宣傳，亦當如之〔同註四十二〕。

國父將宣傳訓練機構視作「大軍事會議」、或「大兵工廠」，以其既能擬定作戰計劃，又能供給作戰子彈〔註四十七〕。因爲其深信「中國的統一，只有靠這一個宣傳」〔註四十六〕；所以雖於百忙當中，猶對從事宣傳之同志曰：「倘有未明瞭之處，儘可隨時來問兄弟，兄弟必一一詳細解答」〔同註四十六〕。

(二)

宣傳者，不獨能發動群衆，又能帶動群衆；蓋群衆者，或不全然服從其領袖，但却必然服從於輿論；此即 國父所以謂宣傳「爲輿論之母也」〔註四十九〕。若能以宣傳力量造成輿論，則無異於造成時勢。

惟今日舉事，稍識事務者不能不以輿論爲依歸；若能造成多數人之輿論，不生衝突齟齬種種問題，則不患當事者不降心相從〔註五十〕。

而最能造成輿論以形成時勢者，則爲知識分子，故 國父曰：「此次革命成功，多賴學界之力」〔註五十一〕。若得學界起而擁戴、與起而宣傳，則革命必勝、建國必成。因爲「士爲四民之首」，所以 國父特勉其「急起研究，設法推行」〔註五十二〕。

在革命的進行過程中，固然「慷慨助餉，多爲華僑」；但其「熱心宣傳，多爲學界」（中國革命史、三）〔註五十三〕。釋言之，華僑之所以「慷慨助餉」，則由於學界之「熱心宣傳」。揆諸中外革命史蹟，其提倡與贊助者，多爲學界之力量。

各國改革精神，多半由學生首先提倡，即以我們推倒滿洲、掛起中華民國招牌而論，學生的力量最多〔同註四十〕。

國父早已意識及此，所以首以一萬多留日學生，做爲同盟會的會員〔同註四十三〕。蓋學生最易於訓練，亦最優於宣傳；其所以戰勝保皇黨與推翻滿清者，此爲其潛在的基本力量。

因爲學生爲最優良的宣傳幹部，所以 國父對其期望最殷，勗勉最切。

你們學生今天應作先知先覺，發明真理，以引導社會、引導人羣〔註五十四〕。若全國學生都能以宣傳的力量，以「引導社會」與「引導人羣」，則「不出十年，中國一定太平」。

你們學生能將解決國家的方法，宣傳全國，使各地學生做革命的工夫，不出十年，中國一定太平了〔同註五十四〕。

學生的宣傳效能如此，學生與國家的關係又如此，所以 國父勗勵學生們自我充實、與自我訓練。

夫在學生時代，政治雖若與己身無關，而政治之理想與智識，實爲學生要素，乏茲要素，而謂將來能救國者，未之敢期也〔註五十五〕。

國父之對學生不獨熱愛，而且信任，故曰：「今天希望你們做革命的事業，把革命的工夫交給你們做」〔同註五十四〕。而學生所能做的革命工夫，也就是展開宣傳、與培養輿論。

（三）

羣衆中以「不知不覺者」爲多，「蓋林林總總皆是也」（孫文學說第五章）。故 國父曰：「冀以救國大義，提撕羣衆」〔註五十六〕。正因羣衆之「林林總總」

，所以導之東則東嚮，導之西則西嚮，故曰：「大抵凡事，貴有提倡」〔註五十七〕。而「提倡」僅爲發端，尤須繼之以「鼓吹」，始可奏效。

根本之圖，自以鼓吹民氣、喚醒社會最爲切要〔註五十八〕。

尙希鼎力提倡，設法鼓吹，並請諄告僑寓諸同胞〔註五十九〕。

然而，「提倡」固可始之以「孤力」，而「鼓吹」則須藉之以「羣力」；人的天性雖能合羣，「但是羣性的程度，不及蜜蜂和螞蟻」〔同註四十五〕。因爲人類並非全爲盲從者，故必講求方法，否則極易發生「反宣傳」的效果，正如 國父說：「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足混亂是非，阻碍進化也」（孫文學說第五章）。

所以， 國父固曾指示「用高尚的思想，和超絕的理想，來從事鼓吹」；爲宣傳的原則之一〔註六十〕。但却又云：「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農民才注意」〔註六十一〕；並謂「把工人和資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傳到工人裏頭」（民權主義第三講）。這顯然是顧及基層羣衆的水準，亦即注意「普通人極歡迎的心理」〔同註四十五〕。換言之，宣傳者必須認清對象，尤須針對聽衆的心理。

拿他們心理上極歡迎的話去演講，便可以感動許多人，不必費很大的力量，便收很大的效果〔註四十五〕。

可知宣傳的資料，應該因人而異，面對知識分子，固應「用高尚的思想，和超絕的理想」。而「普遍的宣傳，是要對極無知識的羣衆去演講」〔同註四十五〕。此外，尤應注意「隨時而變」，即「先當動之以大義」，次者「再動之以大利」，最後「則當動之以情誼」〔註六十二〕。釋言之，能動之以「義」，即不必動之以「利」；並且宣傳者最應視聽衆如朋友，最好亦能使聽衆視我爲朋友，因爲互相建立「情誼」之後，則最能因「感動」而產生「效果」。

宣傳時，固應視聽衆爲朋友，尤應把家族與朋友視爲聽衆；換言之，「由遠及近」固然可以，但尤應「由近及遠」〔註六十三〕。如：

諸君所用的宣傳方法，就對人而言，應該由近及遠，先對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說明，再對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說明〔同註六十三〕。

不論對何等人進行宣傳，總要如教士傳道一般，「就措詞而言，所說的話應該親切有味，要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同註六十三〕。如此，則「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義，便深入刻骨，便能夠爲主義去死」〔同註四十五〕。國民黨應該效法基督教青年會，「在二十二行省之內，都有完備的機關」，以宣傳主義，喚醒國魂〔註六十四〕。更要起效教士們的犧牲精神，以盡瘁於宣傳事業。

教堂被毀，教士被害，時有所聞；即在外國，新教亦迭遭反對。然其教徒，則皆置而不顧，仍毅然爲之，到處宣傳，不稍退縮。蓋其心以爲感化衆人，乃其本職，因此而死，乃至光榮〔註六十五〕。

儒教與佛教所以能弘揚其教義於世，而至今仍盛者，即因其門徒善爲宣傳與推廣，有以致之〔參同註四十五〕。袁世凱吳佩孚只知擁兵逞強，既不知宣傳方法，又無主義可爲宣傳；所以袁之「洪憲帝國」迅即崩潰，而吳之「武力統一」亦成泡影〔參同註六十四〕。

第三章 宣傳應憑道德與真理

(一)

軍隊爲有形的力量，宣傳爲無形的力量，然而，有形的力量須依靠無形的力量，而無形的力量可變爲有形的力量。此即 國父所以說「革命黨之力量，比較軍隊之力量還大」的道理所在〔註六十六〕。苟若宣傳成功，則其力量的宏偉，誠難計量；亦正因其爲無形者，故能「無堅不入，無人不從」〔同註六十六〕。「無堅不入」者，則指宣傳力量之感動人心，「無人不從」者，則指廣大羣衆之衷心悅服。欲達到此目的，則必須宣傳者素有「至誠」的修養。

要擔負這個責任，須拿至誠做基本，有了至誠做基本，便是有了宣傳材料，便是得到奮鬥的能力〔註六十七〕。

由常識論之，則宣傳材料應爲「高深的學問」，奮鬥能力應爲「雄辯的口才」，但

國父却視此爲次要，而以「至誠」爲主要。

假如沒有至誠，就是有高深的學問，雄辯的口才，永遠還是沒有成功的希望
〔同註六十七〕。

因爲人的修養而達到「至誠」之境界，則其行動必合乎道德，而其言語亦必合乎真理；以道德與真理所「合成」的力量；始可稱爲宣傳力量，故 國父說：

此種力量，全由道德與真理所合成〔同註六十六〕。

亦正因其合乎道德與合乎真理，所以能博得「人人歡迎」與「人人同心」；而人人之所以「歡迎」與「同心」者，則因爲其所宣傳者「係爲公、爲大衆，非爲私、爲一人」〔同註六十六〕。

宣傳爲「改造人心」的工作，即是「除去人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註三〕；亦即使全國同胞思想一致，才能意志集中。所以，欲建設新國家，則須建設新思想。

國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國家的基礎，是建築在人民思想之上〔同註六十八〕。

使人人瞭解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之後，則其愛國之心，必油然而生，所以宣傳的力量，可使「我四萬萬同胞，應同心同德，力圖建設，以謀富強」〔註六十九〕。而三民主義正是爲謀國家富強與人民康樂的寶典，此即 國父所以「願以此主義爲海內倡」之用心所在〔註七十〕。

國父所以必以主義「爲海內倡」者，就是深知欲創造「國利民福」之大業，必須求得人民的思想合作；是以則務須經由宣傳的途徑，以獲取人民的信仰。

以至吾黨之用心行事足爲國利民福者，世人莫或知之，雖有良善政策，無從宣達，以起國人之信仰，此最爲遺憾者〔註七十一〕。

因爲無論革命與建國，則全憑得人心，亦即全憑宣傳力量，使「全國人都佩服，全國人都信仰」〔註七十二〕。蓋唯有努力宣傳，始可貫通人民的思想。

要諸君注重宣傳，教本黨以外的人，都明白本黨的主義、歡迎本黨的主義。

〔同註七十二〕。

人民是否「歡迎」本黨的主義，則須以「明白」爲先決條件，而「明白」者，就是思想的貫通，「歡迎」者，就是內心的共鳴。所以 國父主張「把三民主義的道理注射到人民心內」〔註七十三〕；「把三民主義的精神同化到全國」〔註七十四〕。由此可知，三民主義既有其「道理」，尤有其「精神」，所以，宣傳時必須闡明其道理、發揚其精神。並且，欲以主義的「道理」而「注射」於人心，則必須舉述其「真理」；欲以主義的「精神」而「同化」於全國，則必須展示其「道德」。蓋「真理」爲客體、無真理則人民不信仰，「道德」爲主體、無道德則人民不佩服〔參見註七十二〕。此所以 國父說宣傳力量，乃「由道德與真理所合成」者也〔參見註六十六〕。

（二）

何以「至誠」便是「最大的力量」？因爲宣傳的時候，唯以「至誠的心思」、始能「感動」民衆，唯以「至誠的心思」、始能「感化」民衆〔同註六十七〕。「感動」者，乃謂人民因感而動，由不知主義、到歡迎主義；「感化」者，乃謂人民因感而化，由反對革命、到贊成革命。而歡迎主義，即是接受主義，贊成革命，即是參加革命；這便是「至誠」所發出之「最大的力量」。

我們要趕快宣傳革命主義，令所有的民衆都知道，令人人都通曉，要全國的人民都來贊成革命，同我們合作，那麼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同註六十七〕。

可見 國父所期望之「成功」者，乃是全國人民都來「贊成」、都來「合作」；這的確確是一樁大事業。所以致力宣傳的同志，必須有高度的道德修養，以終身奉獻、終身犧牲。

要誠心爲革命來奮鬥，誠心爲主義來宣傳，要以宣傳爲終身極大的事業；存「至誠」的心思，要能犧牲世界一切權利榮華，專心爲黨來奮鬥〔同註六十七〕。

可知宣傳者，乃革命大業中的專業，亦為專業的革命大業，舍宣傳而外，如何能使全國人民都來「贊成」與「合作」？此即 國父再三說明「武力之不可靠，而主義、真理、道德之為可靠也」〔同註六十六〕。

國父謂宣傳乃是「以道德征服他們」〔同註六十六〕，而此一「征服」事業，乃一「共同」事業；換言之，欲得宣傳之成功，不但須個人之「終身」，尤須衆人之「一致」。

不是要一兩位黨員去實行的，是要大家共同去實行的；大家共同去實行，便是一致行動；一致行動，就是黨員的好道德〔註七十五〕。

案宣傳為大業、為羣業， 國父固願「同志各盡厥職」〔註七十六〕，但其更要「大家同心協力」〔同註七十五〕。如果只能奮鬥，而不能團結；換言之，在宣傳時，只知努力，不知配合，則仍屬失德，仍必失敗。

本黨黨員從前常有自以為是的，便要獨斷獨行，所以弄到全黨精神，非常渙散；革命事業，不能成功〔同註十〕。

因此 國父勉以堅守革命的「好道德」，以團結之精神、與團體之力量，以「闡我黨綱，揚我黨譽」〔同註七十六〕。

國父深信以道德與真理，所構成的宣傳力量，可以為「振三民之木鐸，導五權之先河」〔註七十七〕；簡言之，其必能「宣傳主義，啓牖文明」〔註七十八〕。古人所謂「志誠所至，金石為開」者，則認為即指此而言〔註七十九〕。因為只要宣傳成功，則革命一定成功。

今日時事維艱，然最後之成敗，自以民意之向背為斷，吾人苟能務其遠大，懸的以趨，黽勉不懈，總不慮無水到渠成之日耳〔同註七十九〕。

所謂「水到渠成」者，乃是以自然的力量，達到自然的成功；此即宣傳的作用與功效。 國父曾以孟子「仁者無敵於天下」之語以自信〔註八十〕，其「懸的以趨」者乃此也；蓋唯仁者能修其道德、明其真理，亦唯仁者、能盡其在我、與與人合作。

(三)

國父非常自信，只要宣傳成功，則中國「一定太平」〔註八十一〕，而且是「和平統一」〔同註八十〕。雖然「吾黨之兵力常居於弱的地位，而敵則常居於強的地位」〔註八十二〕；但 國父的信心仍極堅定，而其信心乃是基於主義。

要做到這樣的偉大事業，只有本黨才有這個力量；因為本黨是有主義的，別黨沒有主義〔同註六十八〕。

故曰：「我黨兵力雖弱於人，惟主義則高尚於人」〔同註八十二〕。只要「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宣佈到全國民衆」；我們便可以「有勝無敗，天天成功」〔同註七十五〕。

所以 國父特別勉勵黨員，必須「人格高尚，行爲正大」〔同註七十二〕，應以宣傳爲「大事」，並以「傳教」之精神致力之，只要「羣策羣力，大家去奮鬥」〔同註六十八〕，則黨員之宣傳，自必易於教士之傳道。

我們的這種主義，比宗教的主義，還要切實；因為宗教的主義，是講將來的事，和世界以外的事。我們的政治主義，是講現在的事，和人類有切膚之痛的事；宗教是爲將來靈魂謀幸福的，政治是爲眼前肉體謀幸福的〔同註六十八〕。宣傳事業固憑本黨的主義、與黨員的修養，然而 國父既曰：「我們的政治主義，是講現在的事」，因之，必須「使我國全國民瞭解予之救國計劃也」〔註八十三〕，「均須要求我全國父老兄弟之贊成者也」〔註八十四〕。所以，國民黨員不獨要能講給人民聽，並且要能做給人民看。

故文深望吾黨同仁放眼遠大，從社會民生方面做切實工夫〔註八十五〕。

至於會中所辦最重要的事，即刻就要拿出去做宣傳材料的〔同註七十五〕。若是只能說、不能做，則不但失德，而且失政。所以 國父主張先把廣東、四川建設成模範省，進而擴及西南，以推動全國〔註八十六〕。以主義爲建設的藍圖，再以建設的成績作宣傳的資料，如此兼增遞進，則最容易得到人民的佩服與信仰，故國父說：「宗教徒宣傳空虛的道理，尚可收到無量的效果；我們政黨宣傳有可憑據

的道理，還怕不能成功嗎」〔同註六十八〕？

革命爲仁人志士之事業，宣傳亦爲仁人志士之事業，故必須以高度的同情心與憐憫心，以從事宣傳，方能感動人與感化人；譬如 國父講到教育政策時，則引證事實曰：

像諸位將士由湖南走到廣東，沿途所見的小孩子，有多少讀過了書呢？再像

現在演說場中這些放牛的小孩子，有沒有機會去讀書呢〔註八十七〕？

國父此語，乃是「視人之子若其子」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此乃仁人之心、仁人之懷也。焉有仁人而忍心只坐而言、不起而行者？此所以 國父既倡導「鼓吹」、尤倡導「行事」也〔註八十八〕。

欲求以政績而爭取人民之「向心」，則尤必須注重績效，故曰：「遇事就要辦理，萬不可稍有延滯」〔註八十九〕。然而要「鼓吹」與「行事」同舉、「政績」與「績效」兼求，當然「不可依賴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同註六十八〕，此所以 國父又必注重培養人才、與延攬人才。

我們以後要注意培養人才、與延攬人才，將來種種事業，非有多數的人才莫辦〔同註八十九〕。

有了人才之後，更要以組織的力量，結成團體，蓋「團體既大，則將來行事益易矣」〔同註八十八〕。而組織的方法，則靠黨的指導，故 國父說：「大家都是國民黨員，應該負擔這個責任，用宣傳去奮鬥」〔同註六十八〕。

第四章 尤重文字宣傳

（一）

口頭宣傳，固易貫通思想，與產生力量，而文字宣傳，亦與之有同功同能。對工農群衆，則口頭宣傳自較之文字爲得力，對知識分子，而文字宣傳則較之口頭爲有效；兩者應該相輔爲用、兼籌並施。 國父既重視口頭宣傳、亦優於口頭宣傳，尤重視文字宣傳，且長於文字宣傳。若說口頭宣傳之鼓動力大，則應謂文字宣傳之

帶動力強。

世界進化，隨學問為轉移；自有人類以來，必有專門名家發明各種專門學說，然後有各種政治、實業之天然進化〔註九十〕。

國父深知「用筆比用劍還有力」，故曰執筆者「依所指出的方向，發出好議論，也一定一樣有力」〔註九十一〕。揆諸史實，的確如此，如曰：「然能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至成功，皆得力於學說之鼓吹」〔同註九十〕。因為文字力量既能解除人之「迷惑」，又能促使人之「覺悟」。

文近以根本救國，端在喚醒國民，故以學說破其迷惑，俾共生覺悟，則改革自易為力〔註九十三〕。

由此言之，文字力量確有語言力量之所不及者，所以當「人心陷溺，正義銷沉」之際，國父則號召「誠賴有光明正大之言論機關，為之摧廓」〔註九十三〕。

藉文字可以表現「國學淵通，文辭瞻美」，而國學最富感動之力，文辭尤其感化之功，憑此「撰著論評，用揭報端」；則最能「為同志諸君之助，而共策黨務之進行也」〔註九十四〕。茲舉國父一段瞻美的文字於此：

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焉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揚時代也（民報第一號發刊詞）。

案此段文存雖簡鍊，而無不「躍躍焉動」，讀者之心，自必因文字之「躍躍焉動」而「躍躍焉動」；進之必為歡迎民生主義而贊成革命也。因此，國父特將其實業計畫，則連載於報章雜誌，俾廣為宣傳。

吾現所著之實業計畫，經已登載各報各雜誌，流傳於中國者，不止一次，幾無處無人不歡迎之，並未聞有發言不贊成者（實業計畫、結論）。

案國父之實業計畫，能使得人人皆歡迎，人人皆贊成者，則不能不說「文字收功，國福民利」也〔註九十五〕。正因文字特有「流傳於中國者，不止一次」的力量，所以國父特稱其能負擔「巨責」，能建立「奇功」。

夙仰貴報爲吾黨之喉舌，作僑界導師，大聲疾呼，發聲振聵久矣，盡宣傳之巨責，收文字之奇功，一紙風行，萬流景仰〔註九十六〕。

因此，國父不但重視報章，並且愛護報章，如曰：「在滬屢讀貴報，所以發揮吾黨之主張，以嘉惠僑胞者至厚，深爲欣慰」〔同註九十六〕。

(二)

民國成立以前，各革命報紙「大倡民族主義，抨擊滿清政府；而揭彼族之奸謀，不遺餘力；始見者詫爲神異，繼則服其敢言」〔註九十七〕。可見「敢言」的報紙，能令人由「詫」而「服」，其影響力確乎「神異」。蓋報紙之爲物，既無時間限制，又無空間限制，無論從事破壞或建設，都必藉重報紙的力量。

革命成功，全仗報界鼓吹之力；今民國成立，尤賴報界有言責諸君，示政府以建設之方針，促國民一致之進行，而建設始可收美滿之效果〔註九十八〕。蓋報紙之功用，固在「提倡」，又在「督促」；並且能夠「造成一進取之樂觀，喚起國民勇猛真誠之志氣」〔同註九十八〕。換言之，報界諸君既能「指導民衆」〔註九十九〕，又能爲民發言，所以民國前三年（一九〇九），上海民呼報被封，則續辦民吁報，其義爲「民不敢聲，惟有吁耳」〔註一〇〇〕。因此，故國父極重輿論，極重報業。

更非創穩健之輿論，以誘進吾同胞法律上之權利義務思想不可；執是以談，則報館自不可不設〔註一〇一〕。

蓋報業既能開通民智，又能提高民德，且可爲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樑，就此而論，可說：「一紙風行，其效甚捷」也〔註一〇二〕。

以國父親身之經驗，則深知報紙尚有主持公道，保障人權，與倡言正義，激發同情等種種功效。例如其民國前十六年（一八九六）倫敦蒙難獲救一事，固爲其師友康德黎先生 Mr. James Cantlie 與萬生博士 Dr. Wanssion 之百般奔走與呼籲，亦爲地球報 Globe 的發表消息，蓋只要布之於社會，就可獲得營救。

其載予被逮情形，頗爲詳盡，即觀其標題，已足駭人心目。如曰：「可驚可駭之新聞」，曰：「革命家被誘於倫敦」，曰：「公使館之拘囚」。予急讀一過，知英國報界既出干涉，則吾之生命，當可無害；當時欣慰之情，真似臨刑者之忽逢大赦也（倫敦蒙難記、八）。

且 國父脫險後，各大報記者之爭相訪問與爭相報導，已足使 國父之偉大人格，與其所抱之救國主義，大布於世。並且 國父又特投書各報館，申謝英政府與英報界相援之盛情。

予此次被幽禁於中國公使館，賴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釋；並承報界共表同情，及時援助。予於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義，素所欽仰！身受其惠，益堪徵信。且予從此益知立憲國體及文明國人之真價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謀吾祖國之進步，並謀所以開通吾橫被壓抑之親愛同胞乎（倫敦蒙難記、附錄）！案：此固然藉報紙以申謝忱，尤爲藉報紙以爲宣傳；報紙之妙用如此，而 國父亦最善用報紙也。

（三）

政府固應尊重民意，以訂政策，但因羣衆的心理，多爲各私其私者，所以羣衆的意見，亦多爲各是其是者，欲求政府完全遵照民意，實不可能。是則必須「國民自起努力，造成有組織之民意」〔註一〇三〕。而能擔當此一職責者， 國父則屬意報界諸君。

惟諸君（報界）爲輿論代表，務望諸君一致鼓吹，使全國之人，趨向一致〔註一〇四〕。案：報界不獨能製造輿論，且應爲輿論代表，蓋只要報界諸君「一致鼓吹」，就可使全國人民「趨向一致」。可見報界能夠加強人民的向心，與促進人民的團結；所以 國父特勉「報界諸君，在野指導社會」，務必「盡自己的能力，爲國民的向導」〔同註九十九〕。

欲求報界真能夠「指導社會」，則須人民能信仰報界；而欲求人民之信仰報界

，則尤須政府能看重報界。所以，其關鍵仍在政府，而 國父則的確看重報界。如：

我去年自主張北伐，離去省城，八月之久，人民對於北伐，究竟有什麼批評？究竟感着甚麼痛苦？又省城有甚麼變故？很希望記者諸君詳細說給我聽〔註一〇五〕。

此乃藉記者而將下層意見與情形，反映到上層；記者能夠如此，則人民孰不信仰記者！若政府不顧民情，只藉記者為宣傳政令之工具，則記者已不可貴，而人民孰願尊重！

案 國父之意，則記者實無異於民意代表；是則民意代表固應負起宣傳之責，而記者又須與民意代表合作。

聞都督有換舊契議案，交省會議決；深望議會與報界諸君能通過而鼓吹之，于國利民福有絕大關係〔同註十三〕。

而記者上焉者，其可效忠政府，以「擁護法權」，下焉者，其可效忠人民，以「作民喉舌」〔註一〇六〕。其作用與力量，似乎較民意代表為重為大，所以陳炯明叛變， 國父就發動報界，施予筆伐。

我只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日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同註一〇五〕。

因為經由「各報鼓吹」，可以使「人心一致」〔註一〇七〕；只要人心能夠「一致」，就可形成「輿論」，而輿論就是力量。若歸結言之，發動輿論者，則為報界。

輿論為事實之母，報界諸君又為輿論之母〔註一〇八〕。

國父深信筆墨之力，能夠「以吾黨之道，力導黑暗以光明」〔註一〇九〕，所以每遇大事，常以記者作其「後盾」〔註一一〇〕。其制裁叛國軍閥，固藉其力，其倡導國民會議，亦藉其力。

我今天招待諸位新聞記者，就是要借這個機會，請諸君分擔這個責任，來贊成國民會議，鼓吹國民會議〔同註一一〇〕。

中國之傳統政治，是尚文治而輕武功者，國父爲中國文化之集大成人物，所以始終堅信筆力勝過槍力；故曰：「倘使羣倫遵循有道，斯真遠勝於三千毛瑟也」〔同註一〇六〕。

(四)

國父不獨每日展閱各報，並且樂於常與記者會晤，其每與記者所談者，雖爲和平統一與社會建設等國家大政，但其語意，却在輕鬆坦暢中，表現出極度親切與懇切的態度〔註一一一〕。雖然公務特忙，尤願以「談話會」的方式，定時招待記者。

此種問題須耐研究，甚願報界諸君設一談話會，討論其事，可以隨時問答〔註一一二〕。

此種作風，固可促使人民重視記者，尤可引動記者之自爲重視；唯如此，始可提高宣傳的功效，加強輿論的力量。

政府與人民既一體尊重報界，則報界地位自然提高，責任自然重大；基於道義與義務，報界應該協助政府，與輔導人民；絕不可專以攻擊爲能事。

今回粵省，見各報之言論益紊，不按公理、攻擊政府。不知一般人民重視報紙，每謂報紙經載，必有其事；以致人心惶惶，不能統一〔同註一〇七〕。

政府尊重報界，而報界攻擊政府，其結果，當然「人心惶惶，不能統一」；對國家、對人民，兩皆不利。蓋其不獨在國內損於政府的威望，並在國際傷於國家的信譽。

所惜者廣東報界之言論尚未一致，在外省或外國之人，不察內容，將疑我廣東尚多紛擾，故言論不一致，其害實深〔註一一三〕。

報界既以「攻擊」爲尚，而言論又不一致，當然造成「尚多紛擾」，而以至「其害實深」。欲求報界之「言論一致」，而導致人民之「一致贊成」，則政府與報界之間，態度應該坦誠，思想應該溝通。

故今日邀請諸君相會，甚願各發揮所見，指教一切；尤願持反對論者暢所欲言

言，或有懷疑亦請提出，兄弟當盡所知以答復之〔同註一一三〕。

可見 國父乃以報界爲朋友，不以報界爲工具，蓋記者乃人民的記者，政府乃人民的政府，此爲專制時代與共和時代的不同處，故 國父說：「報紙在專制時代，則利用攻擊，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報紙在共和時代，則不利攻擊，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同註一〇七〕。

國父既視記者爲朋友，當然必愛護記者，所以遇有武人之迫害記者者，則極爲痛心，亦極爲痛恨。

彼武人專制，其痛苦不能盡言，如報界記者，亦曾受桂逆槍斃，而廣東人亦有槍斃記者，此非武人專制欲防民之口乎〔同註一〇五〕！

所以 國父誓必「打破武人專制」者，固爲「擁護憲法」，以捍衛國家；亦爲「主持正義」，以保障輿論也〔同註一〇五〕。槍桿雖然兇暴，但筆桿絕不應屈於槍桿，唯必須採迂迴戰術，以掩護宣傳攻勢。

諸君有習見動物學者乎？動物學言，有一種蟹，穴居草陂，必將其穴外之草除去，其遺傳性然也。不料有一種鳥，專認無草之標誌，下啄食之，蟹種幾無噍類。後生一種蟹，改易方針，穴處必護以草，其種乃得保全。故今日報紙，必須改易其方針〔同註一〇七〕。

蓋 國父深信筆力勝過槍力，只要出其不意，攻其要害，以喚起民心，集中民意，則武人必敗，文人必勝。唯報界諸君必須「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論」〔同註一〇八〕。否則，步驟不齊，行動不一，則不易造成弔民伐罪的輿論力量。

國父之尊重報界，愛護記者，其用心乃至公至誠，亦即「以今日有言責諸君，所荷之責任甚重」〔同註九十八〕。換言之，「今民國成立，尤賴報界有言責諸君」〔同註九十八〕。故曰：

當革命時代，報界鼓吹不可少；當建設時代，報界鼓吹更不可少〔同註九十八〕。亦正因其重視報界，與愛護記者，所以對報界之注意頗殷，對記者之要求頗嚴。例如其曾經「近觀上海各報」，而以其「言論不能一致」爲憂〔同註一〇七〕。並希望

「全仗報界鼓吹之力」，而培養「人人心中有勇猛進取之精神」。所以對報界之心理與精神，尤其特別關心與觀察之。

惟以僕觀察社會之心理，多不免抱一種悲觀，於報界尤甚〔同註九十八〕。

蓋 國父深恐由報界之「悲觀心理」，而釀成全國之「悲慘氣象」，所以極主張對報業之改良，與對記者之淘汰。

是日，廣州民國日報「影響錄」有筆名「蘭」者。作「少談主義」短文，刊於 先生「民權主義第一講」之右上方，先生閱之甚怒，乃就原報批曰：「編輯與記者之無常識，一至於此，殊屬可歎！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權主義，而上面乃有此影響錄，其意何居？」因「着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此記者革出，以為改良本報之一事。文批」〔註一一四〕。

案：此乃 國父之嚴正態度，亦為 國父認真負責之表現；其所以如此斷然處置，而毫不姑容者，則正因其愛之、重之也。

(五)

報紙固有其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之功能，然亦必須顧到廣大讀者的水準，若有意義深遠的長篇大論，自非一起讀畢，則不能心領神會、而被其振動鼓舞，若為之連載於報紙，則往往失去時效，且減縮興趣。所以 國父既重報紙，尤重雜誌；既以「日刊報紙蔚然雲起」為慰，尤以「雜誌缺然未有聞」為憾〔註一一五〕。並特指出，雜誌較之報紙，有其特具之功能。

然求其移風易俗，感人之深者，日報之過目易忘，不如雜誌之足資玩索也〔同註一一五〕。

正因其「足資玩索」，所以能「感人之深」。 國父特舉黑奴籲天錄一書為例，以說明雜誌或專刊的重要性。

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書，是把黑奴受痛苦的種種事實，編成一部小說，令人人看到了之後，都很有趣味。這本小說是叫做黑奴籲天錄；自這本書做出之後

，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樣受苦，便替黑奴來抱不平（民權主義第三講）。所以 國父認為新思想新學說，可以發生「鼓盪陶鎔之功」，並且「以為灌輸學識」，為其救國的根本主張〔註一一六〕。因此， 國父之「專志著述」，乃「欲以主義普及國民」〔註一一七〕； 國父之「閉戶著書」，乃「冀以學說喚醒社會」〔註一一八〕。並且，其講述三民主義，刊布之，「使成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三民主義，自序）。

國父之一著一述，皆不忘以文字之力，以宣傳其救國之旨，例如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其應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翟爾斯 Herdert Giles 之請，所作之自傳曰：「心傷韃虜苛殘，生民憔悴，遂甘赴湯火，不讓當仁」〔註一一九〕。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於支那現勢地圖識言中曰：「感慨風雲，悲憤時局，憂山河之破碎，懼種族之淪亡」。其序三十三年落花夢（光緒二十八年），則推贊日人宮崎寅藏「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其序太平天國戰史（光緒二十九年），則頌揚朱元璋、洪秀全「提三尺劍，驅逐異胡」〔註一二〇〕。其在江蘇月刊發表之支那保全分割論，主張中國人應該「因其勢，順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註一二一〕。

由於 國父特重專冊之宣傳，所以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廣州事敗，亡命日本時，特帶揚州十日記與明夷待訪錄等有關民族主義之專書，經委託橫濱文經印刷店各印萬冊，分送海外各埠〔註一二二〕。倫敦蒙難之翌年，又以英文撰成倫敦被難記，不但將滿清之專制腐敗暴露無遺，並將其革命主義大白於世，一時海內外志士，皆因崇拜而願與結識，日人宮崎寅藏及平山周等之贊助中國革命，即因讀其此著而生傾慕之忱者〔註一二三〕。而 國父認為宣傳力最強的專刊，則為革命軍與民報。

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孫文學說第八章）。

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自有

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同前）。

民報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創於東京，流布極廣〔註一二四〕。而國父早於前一年在舊金山托中西日報社代印革命軍一萬一千冊，分贈旅美各地華僑〔註一二五〕。

民國八年，國父在滬創辦建設雜誌，將英文原著實業計劃譯成中文，分期發表；所組織之建設社，乃為研討建設國家之具體問題〔註一二六〕。國父對此建設雜誌期望最重，特撰發刊詞曰：

以鼓吹建設之思潮，闡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功，由是萬眾一心以赴之（建設一卷一期）。

國父又以「中國文字外人無從了解，其所影響者止於吾國人」；乃於民國九年，計劃設立英文雜誌及印刷機關於上海，俾將「建設上之計畫，宣傳於世界」〔註一二七〕。總之，國父最重視專刊宣傳，亦最長於專刊宣傳，在革命時期，「國內外出版物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註一二八〕。並曾於海外以「學報」的名義，而印製「單張」，「專言激烈之事以動人」，「按照看報者之地址以分寄」〔註一二九〕。案：言則務求「激烈」，而事則務求「動人」；既免費以贈，又免費以寄；故其鼓動力最強，亦即宣傳力最強也〔同註一二九〕。

（六）

各革命報紙雜誌之創辦與擴充，則多由國父所發起，或由國父所贊助，並樂為撰寫發刊詞及籌集經費〔註一三〇〕。以新加坡之中興日報「於大局甚為有關」，乃為勸募股金，成立公司，而號召「外埠同志協力」〔註一三一〕。又以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必可一華僑之志」，「關係於中國前途甚大」，所以親筆填寫委權狀，特請林直勉代表出席股東大會〔註一三二〕，即此各端，足見國父如何重視文字的宣傳力量。

國父之尤令人欽佩者，即其每當革命事業之後，則不但不因而灰心縮氣，而且必因之而更加強其宣傳之進行。此一精神，確乎常人莫及。

先生自乙未廣州失敗，即注意文字鼓吹，至是派陳少白回香港，籌辦中國日報，為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註一三三〕。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則國民黨「在國內黨名無存，黨務無從着手」，同志之流亡海外者，則因「革命精神，完全喪失」；以致「團體不能堅固，主義無由貫徹」〔註一三四〕。但 國父仍然致力於文字宣傳，毫不為懈。

刻正編刊方略，不日脫稿，一俟出版，即行寄上。其如何擴充展布，尚須仰仗宏力〔註一三五〕。

國父在「困苦顛連，備嘗艱苦」之中，仍然「極力籌畫，以便應付」。宣傳時則為之「輒用怛惻」，說服時則盡其「區區誠悃」。終使同志感到「前途有望」，以致於「心志堅銳」；於是得以「重整旗鼓，組織幹部」，因能「精神團結」，故得「黨勢日隆」〔註一三六〕。並為由擴大宣傳而擴大力量，於民國三年特命胡漢民創辦民國雜誌於東京〔註一三七〕。

再由主掌宣傳筆政者之陣容視之，則尤可見出 國父之特重文字宣傳，例如以胡毅生襄助暹羅華暹新報筆政，以馮自由主掌溫哥華大漢報筆政〔註一三八〕；以邵元冲「國學淵通，文辭瞻美」，而荐為民氣報編輯；以陳承謨「學識亦頗可觀」，而荐為光華報編輯〔註一三九〕。以律師何啓為香港中國郵報撰稿，以愛子孫科兼任檀香山自由新報編譯〔註一四〇〕。吳稚暉先生乃國學大師，亦 國父之革命老友，特以數函堅邀其由歐赴美，以致力於少年中國晨報。

弟切望先生為大局一來美洲，千萬勿却；少年中國報願奉月脩六十元美金，只欲先生主論說一門，日不過千餘字，以先生順手揮來，不過一打鐘之時，其餘尚有暇時以致力於著作也〔註一四一〕。

案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當時之總編輯為黃超五、副刊及新聞編輯為李是男，黃伯耀兼任翻譯，黃芸蘇、崔通約、伍平一、張藹蘊等為主筆。人才極一時之盛，堪稱「陣

營極爲堅強」〔註一四二〕。但 國父仍請吳稚暉遠來助陣，以加強其戰力。

東京民報之編輯大員爲陳天華、胡漢民、汪兆銘、朱執信、章炳麟、劉光漢、汪東、湯增璧、張繼、黃侃、陶成章、吳崑、張我華等，故其最能宣導海內外革命思潮，以排斥保皇君憲邪說〔註一四三〕。于右任發刊於上海的民立報，司筆政者有宋教仁、陳其美、張季鸞、葉楚傖、康心孚、馬君武、章士釗等，「一時人才，號稱極盛」〔同註一〇〇〕。東京之民國雜誌由胡漢民任總編輯，居正、戴季陶、朱執信、楊庶堪、蘇曼殊、邵元冲、鄒魯、葉夏聲、張百麟等爲編輯〔同註一三八〕。國父於滬所創辦的建設雜誌，則指定胡漢民、汪兆銘、戴傳賢、廖仲愷、朱執信等五人，共同負責〔註一四四〕。綜上所述，可信 國父的確注重文字宣傳；所以如此，亦正因文字宣傳有其特具之重要性也。

第五章 宣傳應該深入人心

(一)

國父常以「同心戮力」或「戮力同心」以自勵勵人〔註一四五〕，此雖是成語，而 國父常用（細讀文集，隨處可見），可見欲求「戮力」，則必須「同心」，而 國父最重視這「心」字。認爲「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孫文學說、自序）。故曰：

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同前）。

因此， 國父認爲國事之興衰，完全繫乎人心之振靡，所以欲謀國家建設，則應先謀心理建設；換言之，其用人心做建國的基礎。

要用人心做基礎，要用人人之方寸之地做基礎；人人的心內都贊成民國，傾向民國，然後民國才不致倒，才可以鞏固〔註一四六〕。

而欲求建設心理，則必須靠宣傳力量，亦即「以一種之理想普及於人人之心中」〔註一四七〕。而此一理想，就是三民主義，欲求普及，則唯有宣傳；主義能夠深入人

心，自然就可變成力量。

我們必要做宣傳功夫，讓這十幾萬兵，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他們

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註一四八〕。

就是對敵人作戰，也可以用主義力量，用宣傳力量，故 國父說：「能攻敵人之心，就是沒有錢沒有彈，也可以打勝仗，也可以統一中國」〔同註一四八〕。案：此即心理作戰中之宣傳攻勢也。

宣傳主義，只要「能入人心」，則其人「必受感動」，若「其不受感動者，則由其人_有障礙」〔註一四九〕。所以，在宣傳時必須瞭解其障礙所在，而設法消除之，此乃「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之意（孫文學說、自序）。人民之心路暢通之後，則「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爲常識」；則自然易於接受，與易受感動〔註一五〇〕。然而，如何使其「化爲常識」？曰：即是「廣爲宣傳」，使其「普及全國」〔註一五一〕。釋言之，就是突破一點，推動全面。

一個黨員努力爲吾黨主義宣傳，能感化一千幾百人，此一千幾百人，亦努力爲吾黨主義宣傳，再能感化數十萬人，或數百萬人，如此推去，吾黨主義，自能普遍於全中國人民〔註一五二〕。

只要有一半人民被宣傳所感動，則其必能帶動另一半人民，就可達到「得其心者，得其民」之宗旨〔同註一五二〕；如 國父曰：「即以廣東言之，三千萬人，須一半能明白我黨主義，能受我黨感化，方能達我黨目的」〔同註一四九〕。

國父嘗引書經之言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註一五三〕。此言百人一心，必可戰勝萬人萬心之意；簡言之，就是要以宣傳的力量，達到「萬衆一心」〔同註一四六〕。因爲 國父最注重者，就是人民的「心力」。

所謂吾黨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黨從今以後，要以人民之心力，爲吾黨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奮鬥〔同註一五二〕。

所謂「心力」者，就是心之以「信仰」，志之以「堅決」，亦唯有宣傳力量，能使人「樹信仰之心，持堅決之志」〔註一五四〕，若其雖「信仰」而不「堅決」，則其

「心力」必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同註一五二〕；不但不能推廣，而且不能持久，當然更無法形成「大眾一心，羣策羣力」的革命行動〔註一五五〕。

(二)

民國七年六月，國父由汕頭登程，取道台北赴日本，其所以「先赴台灣」者，乃是「欲會見台胞，宣揚主義，以喚起民族意識」〔註一五六〕。案台灣同胞當時處於異族統治之下，而國父乃先藉「宣揚」與「喚起」的途徑，以做拯救台胞的準備。因為革命為救人之事、宣傳為救人之事。

革命為救人之事，戰爭則為殺人之事；軍隊奮鬥是出而殺人，黨員奮鬥是出而救人〔同註一四九〕。

因為革命的成功，「非能專靠殺人，尤須靠救人也」〔同註一四九〕。而此一「救人」方法，就是「化除」其舊思想，「揭出」吾之新理想，使之「發生了大覺悟」（民權主義第一講）。如曰：

頭一種是要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在這個生死關頭須要避禍求福，避死求生。要怎麼能夠避禍求福，避死求生呢？須先要知道清楚了，那便自然要去行（民族主義第五講）。

案：「自然去行」的先決條件，則在乎其「知道清楚」，所以只要真知，必然力行，人人能力行，則人人必自救。而欲求其真知，則必靠宣傳。

救人必應普及，宣傳必須深入，上海人口衆多，「消息靈敏」，其宣傳自有必要，所以特請章炳麟「在滬宣傳」〔註一五七〕。但「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此又必須列為拯救之對象，與宣傳之目標，所以國父主張，宣傳功能應該「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註一五八〕。對工人宣傳，則應使其瞭解國家所處之地位很低，工人之地位更低〔註一五九〕，對農民宣傳，「則說之以解脫困苦之方法，則農必悅服」〔同註一四九〕。愈是不開通的地方，愈要常去宣傳。

倘能常到鄉間沒有開通的地方，把這種道理宣傳得明明白白，使四萬萬同胞

都懂得這個道理，大家出力幫助民國，那就是民國前途的幸福〔註一六〇〕。簡單的說，宣傳就是「令人知，令人曉」〔註一六一〕；只要「四出宣傳」成功，則人民對我「必表同情」；進之「全國團結成爲一體，爲一大示威運動」〔註一六二〕。這便是由宣傳之救人，而達成人民之自救。所以只要抱定宣傳救人的誠心與決心，則必能發動全國民力，而造成「無敵雄師」。

故必須週知敵人之情形，尤須明白了士、農、工、商之狀況。然對待此類人物，非可殺之也，實需生之。如何方可以生之？則須知其痛苦所在，提出方法，敷陳主義，乃能克敵致果；此乃無敵之雄師，無人能抗之者，在乎吾黨能善用之否耳〔同註一四九〕。

案：宣傳有對外對內之分，亦可說有對敵宣傳者、與對民宣傳者；所以必須週知敵情與明白民情；兩者同等重要，不可偏頗。尤其既以宣傳普遍救人，則絕對不容遺漏，就是「農人野老不明大義」者，亦應「由就地人民，分別開導」〔註一六三〕。

（三）

國父主張用「王道」來救國救世，就是「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民族主義第三講）。若云能「感化」人者，便是「王道」，那麼宣傳最能感化人，所以宣傳就是王道的實施。

從前孔子的晚年，周遊列國，他是爲甚麼事呢？完全是宣傳他的主義〔同註一四八〕。

所以，「拿主義來感化全國」，便是孔子「周遊列國」的精神〔同註一四八〕。因爲唯有周遊宣傳，「廣爲鼓吹」，才能使主義「普及全國人心目中」〔同註一五一〕。

宣傳、固是要人民對主義之能知能曉，但知曉之後，必須使之因「感化」而景從，因「心悅」而共鳴。

我們宣傳主義，不特是要人知，並且要感化民衆，要使他們心悅誠服〔同註一六一〕。

所以，宣傳的極致，在由使人民因「覺悟」而生出「決心」，而國家之建設如何，亦全視「覺悟與決心如何」〔註一六七〕。蓋若人民「果爾覺悟」，則自然「羣趨吾黨」也〔註一六八〕。感化爲長時宣傳之致，覺悟爲頓然心通之效；不感化則難以覺悟，而覺悟之後自然生出感化；如此遞相感化與覺悟，則又自然擴大宣傳的功能與成效。所以 國父說：「若是徒然知，而毫不被感化，便是毫無結果」〔同註一六一〕。

所謂「羣趨吾黨」者，即是「歸化本黨」之意〔註一六九〕，而「羣趨」者，指行動之結合一致，「歸化」者，乃心靈之交融一體；簡而言之，就是「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孫文學說、自序）。所以，宣傳乃是社會事業、人羣事業。

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羣〔同註一六六〕。亦即人人皆應盡宣傳之責任，亦人人皆有接受宣傳之義務；其作用與方法，便是「十傳百，百傳千」〔同註一六六〕。如此一縣一縣的推動，一省一省的展開，直至「全國的人心，完全被本黨所感化」〔同註一六六〕。所以說「中國的統一，只有靠這一個宣傳」〔註一六七〕。

(四)

作戰失敗，表面視之，是軍事失敗，而實際上，是政治失敗；換言之，乃主義之失敗，與宣傳之失敗。

因爲戰爭要靠軍人，而現在一般軍人，多是不明主義者；彼等不是爲主義而戰爭〔同註一五二〕。

軍人不知爲何而戰，與爲誰而戰？則已無主宰，已無靈魂；即使兵員再多，武器再精，亦非敗不可。就是偶而僥倖獲勝，亦爲短暫之勝。

如果我們沒有宣傳的奮鬥，那末，我們用槍砲奮鬥得來的結果，便不能夠保持〔同註一六一〕。

若是多用槍砲奮鬥，少用宣傳奮鬥〔同註一六一〕，則「軍隊無暇受宣傳感化」〔同註一四九〕；以致「兵力勝利，吾黨隨之勝利，兵力失敗，吾黨隨之失敗」〔同註一五二〕。

。如此，則雖有軍隊，而「未能成爲革命軍」；所以必須「首當將企望以軍隊謀革命成功之觀念打破之」〔同註一四九〕。此亦可以說政治重於軍事之意，故 國父說：「現代軍人只懂軍事是不夠的，軍事之外，還必須瞭解政治」〔註一六八〕。

既然政治重於軍事，則自應加強軍中宣傳，希能得到用主義征服之真勝利，而不用武力征服之假勝利〔同註一四八〕。所以， 國父特重軍中宣傳工作。

故吾黨宣傳功夫，此後應亟從軍隊着手，庶可以立統一之基礎，願各位同志注意此着〔註一六九〕。

並且更應推動宣傳力量於敵軍之中，譬如辛亥革命所以成功，就是因爲滿清新軍「砲兵營全爲革命黨」〔註一七〇〕。所以，只要於敵後或敵軍之中宣傳成功，則處處都可產生革命力量，誠爲「隱而未發者，在在皆是」〔註一七一〕。因爲 國父最能以宣傳力量而攏絡敵軍，所以則直把敵軍而視爲己軍。

在今日表面上視之，固爲滿廷之軍隊，若於實際察之，誠無異吾黨之勁旅；一待時機成熟，當然倒戈相向，而爲吾黨效力〔註一七二〕。

就是全係滿人的皇室衛兵，亦可深入宣傳而使之變爲革命力量。

此等軍人，嘗經袁世凱之訓練，當時所稱爲新式兵者也；其一鎮則全係滿人，有皇室之衛兵。此等軍人若盡入吾黨，則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註一七三〕。國父之此一「志謀」，「固已早定」，並已「著著進行」〔同註一七三〕。對北軍如此，對南軍亦如此，故曰：「黨員今日第一級工夫，則先設法感化在西南政府旗下之軍隊，完全變爲革命黨員」〔同註一四九〕。甚至發動「黨之全力」，以「努力宣傳於一切軍隊中，使了然於其自身之地位，變反動的兵力爲革命的兵力」〔註一七四〕。

因爲宣傳力量無所不入，無所不興，所以 國父「斷言」曰：「將來必有一偉大、統一、永久之中華民國出現」〔註一七五〕。並以其對宣傳力量具有極度信心。而使 國父「實爲純粹抱樂觀主義之一人」〔註一七六〕；如曰：

如果國民覺悟，而覺悟之黨員負責，則造成中國爲世界第一莊嚴燦爛之真共和，原易於反掌〔註一七七〕。

國父深信，只要士民「知道主義、信仰主義，便可以爲主義去犧牲」〔同註一四八〕；如此則人人可爲軍人，人人可爲志士。但其關鍵，仍在宣傳，故曰欲使人民「知痛苦、知奮發，那便非說穿不可」〔註一七八〕。「說穿」者，就是宣傳之深入與徹底，所以深入與徹底的宣傳，其本身就是一種力量，例如「前爲吾黨大敵之滿洲政府，兵力強於我，而我能推翻之；以後袁世凱、馮國璋等，我亦能推翻之」〔同註一四九〕；此皆「宣傳主義以爲義師之導」的效力〔註一七九〕。其認爲吳佩孚之崛起，乃由輿論，欲將其消滅，亦必經由輿論。

然（吳）佩孚之有今日，則實曩日之輿論爲之，故居今日而欲滅佩孚，仍非先轉移輿論，不爲功也〔同註一七九〕。

所以，國父則將吳佩孚的罪狀「宣布國人」，以求士民之「一致聲討」〔註一八〇〕。尤其「使北方民衆皆曉然於佩孚之惡，而亟思去之，則庶乎成功不遠矣」〔同註一七九〕。

第六章 耐心與恒心

（一）

從事革命宣傳，必須具有高度愛心，化而言之，即由此愛心，而產生出耐心與恒心。其所以需要耐心與恒心者，一則由於「普通人民的確是沒有智識」（民權主義第四講）。一則由於「專制之毒深入人心（而）習於舊污」〔註一八一〕。既要爲其滌除舊污，又要爲其傳述新知，則當然需要耐心與恒心。國父最初「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孫文學說第八章）。由於「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同上），所以雖經「奔走呼號」，而「甚少應之者」〔註一八二〕。如國父說：

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註一八三〕。

由於愛心所產生的決心，國父依然奮鬥不懈，雖然中流社會應者寥寥，乃轉入社會底層，以謀結合會黨。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爲寥寥〔註一八四〕。

所謂社會底層之會黨者，乃爲勞苦大眾或江湖俠士，欲相尋而與之結合，亦相當不易。換言之，仍需耐心與恒心。

國父號召同志致力於革命宣傳數十年，然而直至民國五年，不但瞭解共和之義者「尙不謂多」，並且仍有「深表反對」者。

今中國國民四萬萬，其能明瞭了解共和之意義，有共和之思想者，尙不得謂多；其未了解並無此思想者，於共和深表反對〔註一八五〕。

華僑雖然號稱「革命之母」，美坎兩國雖爲民主國家，然而「現時（案：指民國五年）在美國、在坎拿大華僑贊成擁護共和者，什不得一」〔同註一八五〕。廣東雖爲「革命策源地」，但「現在（案：指民國十二年）廣東的三千萬人之中，真正明白本黨主義的人，幾幾乎不及三萬，只有千分之一」〔註一八六〕。但國父仍然堅持其耐心與恒心，策勵同志「熱心爲本黨盡力，替本黨的主義去奮鬥」；並且要下定決心「把那些最反對的心理，變成最贊成的心理」。深信「如果一個人能夠宣傳十個人，在一年之後，便可以得到三百萬人的同志；在三年之後，便可以得到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同註一八六〕。

（二）

從事革命者，真應忍人之所不能忍，與耐人之所不能耐；亦卽不獨應有堅定之決心，並須有涵容之雅量。蓋其所由之路爲窄路，所處之境爲逆境。如國父曰：雖有爲國民利害着想獻身以謀革命者，國民不惟不知助之，且從而非笑與漠視之，此事之必然者也。雖欲爲國民之嚮導，然獨行而無與從；雖欲國民之前鋒，然深入而無與繼〔註一八七〕。

對革命的宣傳者，不但被人「非笑」與「漠視」，並且「常常遇到很多的反對人」〔同註一八六〕。當此時，國父深知此乃「事之必然者」，所以仍然盡其耐心與恒

心。

過細考查那些反對人的心理，大概都是挾持成見，不肯改變；我總是用盡方法去開導，反覆規勸，以至於了解而後已〔同註一八六〕。

案：國父爲了使人瞭解其主義，開導時則「用盡方法」，亦用盡愛心也；蓋無愛心，雖有方法亦不願爲之「用盡」。當其規勸時，而盡其「反覆」之誠，則「反覆」二字中當蘊藏多少耐心與恒心！

爲革命宣傳，乃是「爲主義而犧牲，爲主義而奮鬥」〔註一八八〕；所以必須以自己的「決心」、釀成衆人的「決心」，以自己的「志願」、匯成衆人的「志願」；如此，方能發揮「宣傳」的功能，以獲取「吸收」的成效。

且吾等必先具有此決心，有此志願，然後用宣傳的方法，使全國大多數人民，皆與吾黨具有一樣的決心，一樣的志願。能吸收多一個同志，就可減少一個反對黨〔同註一八八〕。

案：多一個同志，不獨減少一個反對黨，並且增加一個宣傳力量，所以其收穫乃是乘數的增加。國父說：「多一個主持，則多一分效力」〔註一八九〕。可知革命的初期過程中，其效力乃是一分一分的增加者，因其需要時間，需要人力，所以就必須耐心與恒心。

(三)

革命乃是極長程的道路，且必然要遭到許多次失敗，所以不但不可因失敗而灰心，並在更應在失敗中求發展。國父便是如此，如曰：

我每次革命失敗，逃至海外時，無不極力尋新同志〔同註一八八〕。

案：國父「每次」失敗時，以至國內無立足之地，逃至海外而仍然「極力」求發展；此益見革命導師魄力之雄壯、與毅力之堅強。

國父計畫的革命進程爲三十年，缺乏耐心與恒心者，誰肯奉獻三十年的生命！且三十年者，正無異於畢生奉獻。國父有此信心，所以從不灰心。

我記得有一次到舊金山，有一位青年對我說，謂極佩服我每次失敗，毫不灰心，而且精神更強。但我是相信革命事業，要三十年成功者，如二三次之失敗，算得甚麼，何至令我灰心〔同註一八八〕。

案：國父所以於失敗之後，而仍然「精神更強」與「毫不灰心」者，因其絕對相信主義力量與宣傳力量，且認為必於長期中始能藉宣傳力量而顯出主義力量。

諸君擔負宣傳的任務，應該有恒心，不可虎頭蛇尾，今日熱心奮鬥，明日便心灰意冷；因為要人心悅誠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動，能夠收效果的。

必要把我們的主義，潛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是有效果〔註一九〇〕。

欲將主義「深入人心」而使之「潛移默化」，則當然非靠宣傳力量無以為功。所以革命進程要三十年，宣傳亦要配合三十年，絕不可「半途而廢，當中停頓」〔註一九一〕。國父曾為舉例曰：

譬如燒火煮飯吃，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如果把火燒燃了，米也洗好了，柴米水火，都預備得很完全，正在鍋竈之內，燒火煮飯，忽半途停頓，不去添些燒火，鍋內的飯能不能夠煮熟呢〔同註一九一〕！

案：米飯要燒火才能煮熟，主義要宣傳才能發光，所以國父特曰：「非請諸君對於宣傳，做繼續的工夫不可」〔同註一九〇〕。

(四)

固然，宣傳應為革命的前驅、而進行三十年，但宣傳的永恒性、不因革命成功而停止；釋言之，破壞時期、固應宣傳，建設時期、亦應宣傳：

因為兵力只可用來做破壞的事，不可用來做建設的事。要做建設的事，便要有主義和方法；要全國人都明白建設的主義，便要有宣傳〔同註一九〇〕。

換言之，軍事有止境，宣傳無止境；所以，雖然革命成功，而宣傳仍應繼續。因為實行主義時，正是需要宣傳之時。

革命以後，大家有了軍隊，有了政權，以為事在實行，不必注意宣傳；豈知

革命成功，就只有宣傳一道〔註一九二〕。

革命成功以後，爲了國家建設與社會建設，更應該加強宣傳與擴大宣傳。國父甚爲看重宣傳，所以視宣傳爲大事，勉以「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同註一八六〕；故曰，雖然「革命成功」，仍然「只有宣傳一道」。換言之，「民國一天沒有建設好，本黨就要奮鬥一天」〔同註一八六〕。

「竭力宣傳」就是「革命精神」，而「革命精神」就寓於「竭力宣傳」之中〔一九三〕。所以欲求革命精神永遠煥發、永久彌漫，就必須永遠鼓吹、永遠宣傳。

國父深邃宣傳之道，而又能終身力行之，故曰：「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註一九四〕。

附 註

- 〔註 一〕國父全集第二冊五六八頁「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
- 〔註 二〕國父全集第二冊五八二頁「黨員應協同軍隊來奮鬥」。
- 〔註 三〕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二一頁「和平統一化兵爲工」。
- 〔註 四〕國父全集第二冊八六五頁「裁兵之重要與處置方法」。
- 〔註 五〕國父全集第二冊一八七頁「中國革命史」。
- 〔註 六〕國父全集第三冊四四三頁「致民友會同人望堅持對外交之態度函」。
- 〔註 七〕民族主義第六講。
- 〔註 八〕國父全集第二冊三四八頁「國會主權論」。
- 〔註 九〕國父全集第二冊四五八頁「實行三民主義及開發陽朔富源方法」。
- 〔註 一〇〕國父全集第二冊六八八頁「同胞都要奉行三民主義」。
- 〔註 十一〕國父全集第四冊一四四一頁「越南中法學生雜誌題詞」。
- 〔註 十二〕國父全集第二冊四六一頁「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 〔註 十三〕國父全集第二冊八六三頁「裁兵爲謀統一之政策」。
- 〔註 十四〕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二五頁「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重任」。
- 〔註 十五〕國父全集第三冊八頁「上李鴻章陳救國大計書」。
- 〔註 十六〕國父全集第二冊五〇九頁「黨務進行當以宣傳爲重」。
- 〔註 十七〕孫文學說第一一三頁。
- 〔註 十八〕國父全集第二冊七〇〇頁「語言文字的奮鬥」。
- 〔註 十九〕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九三頁「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
- 〔註 二〇〕國父全集第二冊八七一頁「中國國民已有能力解決全國一切大事」。

- [註二十一]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六頁「支那保全分割合論」。
- [註二十二] 詳見國父全集第二冊六七頁「中國問題的眞解決」；及七五頁附錄「支那問題眞解」。
- [註二十三] 國父全集第二冊七二五頁「北伐的原因」。
- [註二十四] 國父全集第二冊六一五頁「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
- [註二十五] 國父全集第二冊四〇三頁「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
- [註二十六]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一四頁「革命思想之產生」。
- [註二十七]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三七頁「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 [註二十八]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五八頁「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
- [註二十九] 參閱國父全集第二冊四一二頁「五權憲法」，與四二五頁「五權憲法演講錄」。
- [註三十]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七七頁「黨員應協同軍隊來奮鬥」。
- [註三十一] 國父全集第二冊三九四頁「修改章程之說明」。
- [註三十二] 國父全集第二冊三八七頁「要造成眞中華民國」。
- [註三十三]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第三十一章「同盟會在國內之組織」。
- [註三十四] 參閱革命人物誌第三集胡漢民。並參閱民國十三年八月十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十一次會議錄」。
- [註三十五] 國父墨蹟第二二〇頁，並參閱革命人物誌第六集、馮自由。
- [註三十六] 林一厂：總理事蹟稿。
- [註三十七] 國父全集第三冊九〇九頁、函電。
- [註三十八] 國父全集第二冊七二七頁「在廣東對黃埔軍官學校告別詞」。
- [註三十九] 民國十四年元月十二日香港中國新聞報，並參閱林一厂：總理史蹟稿。
- [註四十]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二四頁「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重任」。
- [註四十一]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五八頁「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
- [註四十二]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七七頁「黨員應協同軍隊來奮鬥」。
- [註四十三]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三七頁「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 [註四十四] 國父全集第二冊七〇〇頁「言語文字的奮鬥」。
- [註四十五]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九三頁「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
- [註四十六] 國父全集第二冊四〇二頁「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
- [註四十七] 國父全集第二冊六二七頁「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並參閱註四十二。
- [註四十八] 國父全集第二冊四〇一頁「統一中國須靠宣傳文化」。
- [註四十九] 國父全集第二冊八〇頁「民報發刊詞」。
- [註五十] 國父全集第三冊七一五頁「復呂一峯論兩粵收復、蜀亂易平函」。
- [註五十一] 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五二頁「學生應主張社會道德」。
- [註五十二] 國父全集第二冊四四二頁「求學在立志救國」。
- [註五十三] 載國父全集第二冊一八一頁，並參閱註五十一。
- [註五十四]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三一頁「對全國學生總會評議會講詞」。
- [註五十五] 國父全集第四冊一四四一頁「越南中法學生雜誌題詞」。

- 〔註五十六〕國父全集第三冊五九九頁「復雲南黃玉田勗提撕羣衆、一致護法函」。
- 〔註五十七〕國父全集第三冊四八頁「致張永福囑轉要信函」。
- 〔註五十八〕國父全集第三冊六三〇頁「復吉林李夢庚告對奉吉事無成見函」。
- 〔註五十九〕國父全集第三冊二六六頁「爲中華銀行派王癸友前往南洋招股致鄧澤如函」。
- 〔註六十〕國父全集第二冊六七頁「中國問題的眞解決」。
- 〔註六十一〕國父全集第二冊七一九頁「耕者要有其田」。
- 〔註六十二〕國父全集第三冊六〇頁「河口之役致鄧澤如黃心持等函」。
- 〔註六十三〕國父全集第二冊六六五頁「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
- 〔註六十四〕國父全集第二冊五四四頁「國民以人格救國」。
- 〔註六十五〕國父全集第二冊四八九頁「軍人精神教育」第三課。
- 〔註六十六〕國父全集第二冊四五二頁「黨員須宣傳革命主義」。
- 〔註六十七〕國父全集第二冊七〇〇頁「語言文字的奮闘」。
- 〔註六十八〕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九三頁「國民黨奮闘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
- 〔註六十九〕國父全集第二冊三三七頁「努力爲國」。
- 〔註七十〕國父全集第三冊二六一頁「致袁世凱辭大勳位書」。
- 〔註七十一〕國父全集第三冊四一八頁「爲擴張黨務事致陳子岩函」。
- 〔註七十二〕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三七頁「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 〔註七十三〕國父全集第二冊六六五頁「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
- 〔註七十四〕國父全集第二冊三八七頁「要造成眞中華民國」。
- 〔註七十五〕國父全集第二冊六二九頁「黨員之奮闘同於軍隊之奮闘」。
- 〔註七十六〕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五七頁「對中國國民黨廣州市全體黨員大會議訓詞」。
- 〔註七十七〕國父全集第三冊七九八頁「賀吉礁坡中國閱書報社十週年紀念電」。
- 〔註七十八〕國父全集第三冊七九八頁「實兆遠益智書報社八週年紀念電」。
- 〔註七十九〕國父全集第三冊六三一頁「復劉湘勗救國拯民、並派張左丕來川面洽函」。
- 〔註八十〕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二〇頁「和平統一、化兵爲工」。
- 〔註八十一〕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三一頁「對全國學生總會評議會講詞」。
- 〔註八十二〕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七七頁「黨員應協同軍隊來奮闘」。
- 〔註八十三〕國父全集第三冊七八九頁「致廖仲愷告所著國防計畫目錄函」。
- 〔註八十四〕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七七頁「鐵道事業發達、則國家之活動自由」。
- 〔註八十五〕國父全集第三冊六四四頁「復雲南黃玉田告根本救國端在喚醒國民函」。
- 〔註八十六〕國父全集第二冊五四四頁「國民以人格救國」。第三冊五九二頁「致四川黃復生等勗協助楊庶堪等治川函」及八二六頁「復四川但懋辛開辦實業概要函」，並閱註七十二。
- 〔註八十七〕國父全集第二冊六三三頁「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
- 〔註八十八〕國父全集第三冊七四頁「致暹羅海南同志囑速匯款至星俾使轉往歐美函」。

- 〔註八十九〕國父全集第二冊三八七頁「要造成真中華民國」。
- 〔註九十〕國父文集第二冊二四九頁「求建設之學問、為全國人民負責任」。
- 〔註九十一〕國父全集第二冊三八九頁「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
- 〔註九十二〕國父全集第三冊六四四頁「復雲南黃玉田告根本救國端在喚醒國民函」。
- 〔註九十三〕國父全集第三冊八二〇頁「復景梅九允籌助辦報經費函」。
- 〔註九十四〕國父全集第三冊六五三頁「介紹邵元沖與民氣報函」。
- 〔註九十五〕國父全集第四冊一四五三頁「祝澳洲雪梨民報出世詞」。
- 〔註九十六〕國父全集第三冊八二三頁「致覺民日報嘉慰為討陳盡力宣傳函」。
- 〔註九十七〕胡漢民撰「近代中國革命報之發達」（載戊申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加坡中興日報——西曆一九〇九年一月十九日）。
- 〔註九十八〕國父全集第二冊三〇〇頁「政見之表示」。
- 〔註九十九〕國父全集第二冊七三八頁「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 〔註一〇〇〕參閱張雲家撰于右任傳及吳相湘撰于右任先生事略。
- 〔註一〇一〕國父全集第四冊一四一三頁「中國同盟會募集基本金公啓」。
- 〔註一〇二〕國父全集第二冊八〇六頁「地價抽稅問題之研究」。
- 〔註一〇三〕國父全集第二冊八六一頁「欲謀統一、須先裁兵」。
- 〔註一〇四〕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五五頁「報界應鼓吹借款修築鐵路」。
- 〔註一〇五〕國父全集第二冊八五一頁「打破武人專制與平定內亂」。
- 〔註一〇六〕國父全集第三冊八二一頁「復旭報以言論護法函」。
- 〔註一〇七〕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二九頁「言論應歸一致」。
- 〔註一〇八〕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三一頁「民生主義之實施」。
- 〔註一〇九〕國父全集第三冊八二〇頁「復李仁炳勉致力黨國函」。
- 〔註一一〇〕國父全集第二冊七三八頁「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 〔註一一一〕見國父全集第二冊七七五頁以下，談話。
- 〔註一一二〕國父全集第二冊七九八頁「解決民生問題須從契稅入手」。
- 〔註一一三〕國父全集第二冊八三七頁「恢復國會與組織正式政府」。
- 〔註一一四〕民國十三年八月一日廣州民國日報，及黨史會藏 國父批牘原件。
- 〔註一一五〕國父全集第四冊一四〇六頁「新國民雜誌序」。
- 〔註一一六〕國父全集第三冊六二二頁「復四川蔡冰若告著述要旨函」。
- 〔註一一七〕國父全集第三冊六四三頁「唁慰唐繼堯喪祖母及父函」。
- 〔註一一八〕國父全集第三冊六三五頁「復日本廖鳳書告近日閉戶著書函」。
- 〔註一一九〕國父全集第二冊一頁「自傳」。
- 〔註一二〇〕國父全集第四冊一三九一至一三九三頁。
- 〔註一二一〕江蘇月刊第六期（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一日出版）。
- 〔註一二二〕馮自由撰華僑革命開國史話十一頁。
- 〔註一二三〕羅家倫編國父年譜上冊七六頁及胡去非編總理事略三九頁。

- [註一二四]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六一九頁。
- [註一二五] 馮自由撰革命逸史第四集二二頁。
- [註一二六] 參閱國父年譜下冊，及建設社章程（建設雜誌第一卷第一號）。
- [註一二七] 國父年譜下冊及國父全集第三冊六六八頁。
- [註一二八] 國父撰中國革命史，三、革命之運動。
- [註一二九] 參閱馮自由撰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
- [註一三〇] 參閱國父墨蹟卷一，國父年譜卷上，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第四冊「雜文」。
- [註一三一] 國父年譜上冊二六一頁，國父全集第三冊八二至八三頁「為中興報集股致鄧澤如曾士龍函」。
- [註一三二] 國父年譜下冊七五〇頁，國父全集第三冊一四五頁「致吳敬恒函」，及七五二頁「覆少年中國報函」。
- [註一三三] 國父年譜上冊一〇〇頁，馮自由撰革命逸史初集六六頁。
- [註一三四] 鄒魯撰中國革命史第三章第四章。
- [註一三五] 國父全集第三冊二八四頁「為成立討袁幹部致南洋同志書」。
- [註一三六] 國父全集第三冊二八二頁至二九〇頁各函。
- [註一三七] 李劍農撰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 [註一三八] 國父年譜卷上二五八頁及二九七頁。
- [註一三九] 國父全集第三冊六五三頁及七七三頁。
- [註一四〇] 國父年譜卷上六四頁及二七九頁。
- [註一四一] 國父全集第三冊一四四頁至一四六頁「抵美後致吳敬恒函三件」。
- [註一四二] 參閱少年中國晨報五十年簡史（載少年中國晨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 [註一四三] 馮自由著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 [註一四四] 國父年譜下冊七〇七頁。
- [註一四五] 見國父全集第二冊八四〇頁「勗王懋功固守閩圍以利討逆函」及九一二頁「為和平統一事復林建章函」。
- [註一四六] 國父全集第二冊六六五頁「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
- [註一四七] 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二四頁「人心之傾向賴於報紙之鼓吹」。
- [註一四八]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六七頁「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
- [註一四九]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七七頁「黨員應協同軍隊來奮鬥」。
- [註一五〇] 國父全集第二冊八〇頁「民報發刊詞」。
- [註一五一] 國父全集第二冊七九四頁「鼓吹社會主義普及全國人心目中」。
- [註一五二]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五九頁「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
- [註一五三] 國父全集第一冊八一頁「討袁宣言」。
- [註一五四] 國父全集第四冊一四四一頁「越南中法學生雜誌題詞」。
- [註一五五] 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七五頁「建設時代要比破壞時代加倍犧牲」。
- [註一五六] 黃純青撰國父與台灣引戴季陶民國十六年在廣州對台灣青年革命團體講詞（載國父九

十誕辰紀念論文集)。

- [註一五七] 國父年譜下冊七八九頁。
- [註一五八] 國父全集第一冊八七七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註一五九] 國父全集第二冊六七九頁「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
- [註一六〇] 國父全集第二冊三〇八頁「修築馬路是便利交通的好方法」。
- [註一六一] 國父全集第二冊七〇〇頁「言語文字的奮鬥」。
- [註一六二] 國父全集第二冊六一八頁「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
- [註一六三] 國父全集第二冊三一八頁「民生主義有四大綱」。
- [註一六四] 國父全集第三冊八二六頁「復四川但懋辛指示開辦實業概要函」。
- [註一六五] 國父全集第三冊八二七頁「復石青陽促出兵勦譚圖湘函」。
- [註一六六]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三七頁「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 [註一六七] 國父全集第二冊四〇一頁「統一中國須靠宣傳文化」。
- [註一六八] 國父全集第二冊八四一頁「政治的基礎在於地方自治」。
- [註一六九]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三五頁「過去黨務失敗之原因」。
- [註一七〇]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三一頁「對全國學生評議會總會講詞」。
- [註一七一] 國父全集第二冊二〇七頁「中國革命之難易」。
- [註一七二] 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一一頁「同志當共負革命救國之責任」。
- [註一七三] 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一一頁「中國之新軍與革命」。
- [註一七四] 國父全集第四冊一四四四頁「撫輯平民士兵案」。
- [註一七五] 國父全集第二冊八六頁「中國之鐵路計畫與民生主義」。
- [註一七六] 國父全集第二冊八三四頁「約法國會乃共和國之命脈」。
- [註一七七] 國父全集第二冊四五七頁「實行三民主義及開發陽朔富源方法」。
- [註一七八]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〇九頁「黨務進行當以宣傳為重」。
- [註一七九] 國父全集第三冊九〇八頁「復北京學生聯合會告當率師北伐書」。
- [註一八〇] 國父全集第三冊九五三頁「為討伐曹吳復盧永祥電」。
- [註一八一] 國父全集第二冊一八九頁「中國革命史、五」。
- [註一八二] 國父全集第二冊七二五頁「北伐的原因」。
- [註一八三] 國父全集第二冊一八四頁「中國革命史、三」。
- [註一八四] 國父全集第二冊一九七頁「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
- [註一八五] 國父全集第二冊三七〇頁「心堅則不畏大敵」。
- [註一八六]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三七頁「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 [註一八七] 國父全集第二冊一八三頁「中國革命史、二」。
- [註一八八]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五八頁「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
- [註一八九] 國父全集第三冊五一八頁「致陳炯明望通電擁護養電主張電」。
- [註一九〇] 國父全集第二冊五九三頁「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意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
- [註一九一] 國父全集第二冊六五三頁「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

〔註一九二〕國父全集第二冊五〇九頁「黨務進行當以宣傳爲重」。

〔註一九三〕國父全集第二冊二一〇頁「革命須有勇氣與方法」。

〔註一九四〕國父全集第二冊二六二頁「以宗教上之道德補政治所不及」。